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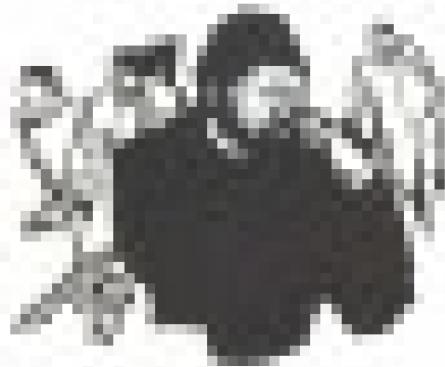
外国文艺丛书

# 老人

〔苏联〕尤·特里丰诺夫著



新編 金剛經疏解





# 老 人

〔苏联〕

尤·特里丰诺夫著

张草纫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Ю. В. Трифонов

СТАРИК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1978, №.3

Москва

根据苏联《各族人民友谊》月刊1978年第3期译出

封面设计：陶雪华

老 人

〔苏〕尤·特里丰诺夫著

张草纫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875 插页3 字数187,0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71,001—104,500册

书号：10188·162 定价：1.10元

## 前　　言

尤里·瓦连金诺维奇·特里丰诺夫是苏联当代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受到苏联和国外评论界的重视。一部分作品，如中篇小说《大学生》、《交换》、《滨河街公寓》已经译成中文。

特里丰诺夫在一九二五年生于莫斯科。父亲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著名将领，死于三十年代肃反运动中。特里丰诺夫在卫国战争时期念完了中学，从一九四二年起在莫斯科的一家工厂里当钳工，后来又当车间调度员和厂报编辑。一九四四年他进了高尔基文学院学习，一九四九年毕业。从一九四七年起，他开始在《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写文章，接着又在《青年集体农庄庄员》杂志和《青年近卫军》文集中发表短篇小说。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大学生》是他在高尔基文学院学习期间开始写作的，一九五〇年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并且获得了一九五一年度的“斯大林奖金”。

后来，他又陆续发表了许多作品，如短篇小说《医生、大学生和米嘉》(1956年)、《罂粟花》(1959年)、《格里沙医生的孩子们》(1964年)、《鸽子之死》(1968年)，中篇小说《交换》(1969年)、《初步总结》(1970年)、《阔别》(1971年)、《另一种

生活》(1975年)、《滨河街公寓》(1976年),长篇小说《干旱的解除》(1963年)、《篝火的反光》(1966年)、《急不可待》(1973年)等等。

特里丰诺夫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的有些作品,在苏联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与争论,并遭到评论界的批评。这些作品以《交换》为代表,有一个突出的主题,就是“现代市侩”。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以浓重的笔墨刻画了形形色色行为卑劣、唯利是图的市侩,对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有所暴露。这些作品引起了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重视。西方报刊上有一篇专文说:“尤里·特里丰诺夫描写苏联城市生活是如此逼真,以至一位俄国人说,读他的作品就象是‘从锁孔里窥视一个人’。他的中篇小说《交换》深刻地反映了一个家庭中的仇恨与贪婪,并被改编成戏剧在莫斯科上演,大受欢迎,剧院场场满座。”而国内持批评意见的人则认为,特里丰诺夫的小说只是描写了一个“人为地密封起来的小世界”,而不是整个苏联社会,说在他的《滨河街公寓》里看不到“可以打破某些令人绝望的命运和处境的力量”。

长篇小说《老人》发表于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各族人民友谊》杂志。这部小说既描写当前的现实生活,又追溯过去的历史。主人公巴维尔·叶格拉福维奇·列图诺夫是一个参加过十月革命的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在一九一九年作为革命军事法庭的记录员,看到了一个冤案的审判过程。受审者哥萨克军长米吉林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却得不到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南方方面军革命

军事委员会中某些领导人的信任，因而以所谓“叛变革命”的罪行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虽然他获得了赦免，然而不久又遭到谋害。时隔五十多年以后，巴维尔·叶格拉福维奇才有可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为米吉林昭雪。巴维尔·叶格拉福维奇把晚年的全部精力用于收集有关米吉林的资料，进行回忆、思考，终于认识到造成米吉林悲剧的历史原因是由于“不信任”。“米吉林的死，是因为有两股气流，暖流和寒流，有两块象大陆一样庞大的云层——信任和不信任，关键时刻在天空相撞，产生了能量异常巨大的放电现象。一股混合着冷和暖、信任和不信任的飓风把他卷走了。”

通过对米吉林事件的回忆，作者企图探求历史的真实：“当你在熔岩中漂流的时候，你是觉察不到热的。如果你处身于时代之中，你怎么能看到时代呢？岁月流逝了，生活过去了，你才能分析：这是怎样的，为什么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换句话说，过去的历史真相，只有在现在，相隔五十多年以后，才可能有一个比较真实的认识。在另外一段中，作者描写了一个借宣扬裸体主义装痴卖傻、韬光养晦的知识分子布尔明，最后得出结论说：“现在，过了三十多年，本来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布尔明的愚蠢，看来是值得怀疑的。要知道，在筹建‘海燕’合作社的知识分子中间，唯独布尔明挨过了这些水深火热的年代，在烈火中没有受到伤害，活到耄耋之年，享受到新时代的幸福。”这里也表明了作者对过去的年代的认识。

而在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中，围绕着争夺阿格拉菲娜的

房子的问题，作者继续揭露“现代市侩”的可憎面目。“老人”的儿子鲁斯兰、女婿尼古拉·爱拉斯托维奇、别墅管理处主任普里霍杰柯和另一个竞争者康达乌洛夫表现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同样都是“现代市侩”。其中尤以康达乌洛夫最为典型。他的一个特点是不择手段。他有一个信条：“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就要把所有的气力，所有的手段，所有的条件，所有的一切都花上去，要钉住不放！”他知道，“任何请求都需要花气力，有热情。用冷淡的语气或高傲的口吻是什么也得不到的。需要低声下气，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甚至用爱情的进攻来使对方感到惊讶，用插科打诨来软化别人。”他需要你时对你卑躬屈节，不需要你时就把你一脚踢开，无论对待搞卑鄙勾当的同伙米嘉、情妇斯维特兰娜，还是自己的岳母波里娜，都是如此。另外一个特点是贪得无厌。他的情妇斯维特兰娜在他准备出国前临别的晚上问他：“听我说，你要老老实实回答我。世界上有各种各样你所享受的或者希望能享受的幸福……譬如说，象我这样的女人，你不是从我身上得到过享受吗？还有家庭，这也给你带来享受，是另一种享受。还有阿格拉菲娜的房子，你希望得到它，把它看作是最根本的享受……还有去墨西哥，你一直在争取，我知道，而且争取到了，你完成了一件别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你得到了它，象得到了一个以前无法亲近的女人……还有莫斯科的其他职位，这可以给你更大的享受，你一直在朝思暮想……不过，告诉我：如果在所有这些东西中间要你挑选一样，你会挑选什么？……你是教会我生活的老师，最后

一次告诉我吧：应该放弃什么？先放弃什么，再放弃什么？女人，家庭，产业，旅行，权力……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康达乌洛夫的回答是：“所有的我都要……”

评论家潘金在分析特里丰诺夫中篇小说的风格时指出，“在特里丰诺夫笔下，由于人物、情绪和环境的不断重现，所以他的每个心理的，社会的典型好象可以同时在几个时间、空间（如今天、昨天、明天；侧面或正面，特写式的或作为背景的）内出现。形象出现了，又消失了；接近了，又走远了。一个接一个……有时又好象不是书里的形象，而是一连串你自己的思想、感觉和回忆把你带到了远方……”。特里丰诺夫的这种风格，在他的后期作品《老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的描写与主人公的回忆，现实与往事，情节与议论，交织迭出，造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

《老人》这部小说问世后，引起苏联评论界的广泛注意。评论家西涅利尼科夫认为《老人》的作者果然致力于挖掘人的真实心理，但是他认为作者对生活中的光明面估计过低，因而这部小说有明显的缺点。另一位苏联评论家赫马拉在评论这部小说时则指出，它描写的一面是围绕着争夺房子的“无谓奔忙”，一面是“崇高地探求真实”，一面是“充满私有欲的世界”，一面是“社会悲剧的世界”。

特里丰诺夫已于 1981 年因病去世，《老人》成为他在世时发表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苏联文化部和作家协会在讣告中指出，特里丰诺夫的创作充满了公民的热情，为确立共

产主义道德原则而进行了不倦的斗争。

译 者

一九八四年五月

七月份来了一封信：“亲爱的巴维尔！我写这封信寄到杂志编辑部去试一试，想通过他们转交给你，因为我在杂志上看到了你的一篇关于谢·基的文章。可惜的是看到它已经晚了五年，而且完全是偶然看到的。不久以前我住在别尔迪扬斯克<sup>①</sup>的女友家中，她家有好些旧杂志，没有用了，我们准备送给孩子们玩，就在一九六八年第三期的这本杂志上突然看到了你的文章和谢·基的小照。这时候我心中的感受，亲爱的巴维尔，你是无法想象的。因为我以前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还活着，也不知道谢·基现在几乎被看作国内战争的英雄人物。你也许已经把我忘了，可是我还深深地记着你，永远对你怀着温暖的感情，我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是阿霞·伊古诺娃，是你住在瓦西里耶夫岛十五条街时的邻居，而你，小巴维尔，同沃洛嘉非常要好，他是我的表弟，当时住在我们家里。一九一九年冬天他在米哈依林镇被克拉斯诺夫<sup>②</sup>匪徒砍死了。我也

---

① 现名奥西品科。

② 克拉斯诺夫(1868—1947)：沙皇军队的将军。一九一八年，克拉斯诺夫发动顿河地区哥萨克人叛变，反对苏维埃共和国。后流亡国外作了法西斯的奸细。一九四七年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对他判处绞刑。

差点儿送了命。你大概还记得吧。是谢尔盖·基里洛维奇救了我。你当时在你的一个亲戚领导的革委会里当文书还是传令兵什么的，而我在谢尔盖·基里洛维奇的军司令部里当打字员。我那时十八岁，你跟我同岁，或许比我稍微小一点。我记得，我们三个人——你，我和沃洛嘉——在普里哥达中学是同班同学。我还有一个哥哥阿列克塞，他是大学生，他站在科尔尼洛夫<sup>①</sup>匪徒一边作战。我心里非常痛苦，不知道如何是好。沃洛嘉是我的第一个丈夫。阿列克塞被打死后，妈妈狠狠地咒骂我们两人。后来我成了谢尔盖·基里洛维奇·米古林的妻子。我非常爱他，他使我重新获得了生命，不过我们在一起只过了几个月，五月份就发生了你所知道的悲剧。亲爱的巴维尔，我一生中经受过许多痛苦，但我现在不在信上告诉你，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否会收到这封信，你现在是否还健在，是否愿意同我通信。我非常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你，那个时期留下来的已经没有别的人了。哥哥和弟弟被打死了，父亲是在罗斯托夫患伤寒病去世的。妈妈同姐姐瓦里雅和瓦里雅的丈夫在一九二一年到保加利亚去了，后来又到了法国。关于他们，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我感到幸福的是，象谢·基这样卓尔不群的人现在终于洗刷了耻辱的污点，这个污点我是从来也不相信的。我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因为现在谁也不知道我曾经是他的妻子，而且还和他生过一个儿子。甚至我的亲人

---

① 科尔尼洛夫(1870—1918)：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俄国反革命势力的头子之一。

也不知道。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坦然无隐地告诉你？你的文章使我不平静。这些年来我本来已经如同槁木死灰了。我不明白，这篇文章为什么恰恰是你写的。难道没有别的人了吗？我早就不姓伊古诺娃，也不姓米古林娜，一九二四年我嫁给格奥尔吉·费多罗维奇·涅斯杰连科以后，我就跟着丈夫姓涅斯杰连科了。格奥尔吉·费多罗维奇是个军事工程师。我们长年累月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还到过远东，到过蒙古。他是在列宁格勒被围时死去的。他爱我的儿子，如同亲生的一样。儿子在三年前由于血液的疾病死了。我现在住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克留可维诺，这是一个城市型的村镇，这里有一所规模宏大的学院，我的孙子就在那里工作。他的母亲也在那里工作。从莫斯科来并不麻烦：乘火车到谢尔普霍夫，然后再乘四十分钟的公共汽车。我盼望着能看到你，亲爱的巴维尔！过去有一个时候我没法见你。不过这一段时间并不长久。愿上帝保佑你健康地活着。有时候，特别是进入老年以后的这几年来，夜里老是做梦，看见我们瓦西里耶夫岛上的街道，我们那幢三层楼的房子，凸出屋外的多角形的偏屋，那里有一间类似阁楼一样的房间，我们有时候避开大人躲在里面。虽然我一生中经受过许多苦难，然而我并不怨天尤人。巴维尔，给我写封回信吧，哪怕两三行也好。拥抱你。你的老友阿霞<sup>①</sup>，安娜·康斯坦丁诺夫娜·涅斯杰连科。

---

① 阿霞是安娜的小称。

“又及：我现在七十三岁，头发全白了，体弱多病，步履艰难，不过还在家里做全部家务工作，因为请个帮工很不容易。怕你万一找不到我，我给你寄上我的孙子和孙媳斯维特兰娜的一张相片，她在相片上要比本人年轻和纯朴得多。他们结婚已有一年半时间了。巴维尔，我永远记得，那时在米哈依林镇你是第一个走到我身边来的人，我记得你说的话和你的脸色，——大家都以为我失去了知觉，然而我看到了，听到了，不过，自然不会有什反应。巴维尔，原谅我这个老太婆吧，给我个回音。”

巴维尔·叶格拉福维奇摆弄着相片，望着那个蓄着小胡子的暴眼的年轻人，视而不见，心神恍惚，只是感到一种象是心脏病发作那样的感觉——情绪不安，浑身发冷，内心深处出现一种紧压着胸口的窒息感觉，——以及由此产生的某种恐惧。有时候，在深夜里，心中劝慰自己：“放心吧，你已经好些了，好得多了，疼痛正在消失，正在消失。”于是就消失了。现在他也这样想：“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是一封普通的信，用不着激动，没有什么了不起，已经有五十五年没见面了！”

阿霞·伊古诺娃一下子出现在他的记忆中。还有十五条街，那幢房子和凸出屋外的多角形的偏屋，铁条做的门。他突然高兴起来——去讲给儿子和女儿听听吧！真有意思，隔了五十五年。不过他马上又想到，不必讲了，因为刚吵过嘴。昨天令人难堪地大吵了一场，他们又是对他不理解，不，问题不在这里，大家都理解，可偏偏不照理解的去做。尤其

糟糕的是轻率从事。没有感情。好象不是亲骨肉似的。他不想对任何人讲，对鲁斯兰也好，维拉也好，小姨子也好，都不想讲。要是加里雅活着就好了。

他拿起信，又看了一遍，心又怦怦地跳起来，于是赶紧放到抽屉里，放进里面一点，塞在文件下面。昨天发生过一次涉及实际问题的不愉快的谈话。真奇怪：维拉和鲁斯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经常对一切问题都要争论的人，一刹那间竟合拍起来。他们多么凶狠地冲过来，提出多么无情的理由。维拉说：“我们这种过不完的愚蠢的贫苦生活真是讨厌死了。为什么我们住的房子要比所有的人差，比所有的人挤，比所有的人寒酸？”鲁斯兰伸出一个手指扬了扬，用威胁性的口气说：“你要知道，你的良心会感到有罪的。你只想到自己精神上的安逸，而不为孙子着想。要知道房子是他们住的，不是我和你住的。”还说了什么老年人的自私啦等等不公平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话。这样的傻瓜，这样无情无义。不，决不能原谅。昨天他把手一挥就走了，因为说也没有用。弄错了，弄错了！不是昨天，是前天。昨天没有事。他没有同任何人讲过话，而是坐在楼上，在阳台上面的小房间里（房间里暂时没有人，因为小姨子到莫斯科领养老金、看医生去了），给格罗兹多夫写回信。格罗兹多夫是迈科普的居民，他在一封文理不通的长信中闹了个大笑话——说什么卡什金镇是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份攻克的，不过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发生在二月份，是二月三日。信是由老战士委员会转来的。写回信很吃力，他冥思苦想，搜索枯肠，可是

由于这些傻瓜的缘故，头脑里老是乱哄哄的，心口也感到隐隐作痛，甚至最简单的词句也忘得一干二净。维拉走上楼来，恶狠狠地敲着门，用寻衅的口气说：“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一声也不答应？故意要惹我们生气吗？去喝茶吧。”故意要惹他们生气——真是胡说八道。好象他们不知道他耳朵重听似的。

这一切都是由于他不肯听从他们的命令：去同管理处主任谈谈关于阿格拉菲娜·鲁基尼奇娜的那幢倒霉的小房子的事。但是他不能啊，不能，完全不能，绝对不能。他怎么能够呢？去同波里娜·卡尔洛夫娜作对吗？去损害对加里雅的美好记忆吗？他们认为，既然母亲已经死了，那么她的良心也就不存在了。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然而不，只要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加里雅的良心就存在着，没有消失。消失当然总是要消失的，而且不久就会消失的，到那时候，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巴维尔·叶格拉福维奇憋着一肚子怨气，一时间把阿霞来信的事忘记了。他沿着破旧的小楼梯走到楼下，准备到厨房里去拿提盒，然后到疗养院去取饭菜。时间还早，午饭要十二点才开始供应。不过他喜欢慢慢吞吞地走去，有时在河边的长椅子上坐一会儿。他喜欢第一个到达厨房，省得吃力地排队。这里排队完全不象城里的“病人食堂”或食品店那样，老是吵吵嚷嚷的，有的人自吹自擂，有的人大发牢骚。提盒分开放在窗台上，在阳光下晒干——瓦连金娜还是不错的，吵嘴归吵嘴，对自己的事情还是尽责的。巴

维尔·叶格拉福维奇把洗干净的提盒叠起来，还拿了一只盛牛奶用的白铁罐，走到阳台上。阳台上已经有不少人在。

由于这一天是星期日，大家都来了：鲁斯兰，维拉和她的尼古拉·爱拉斯托维奇，他们的一个朋友，昨天傍晚来的穿无袖连衫裙的矮女人，还有加利克，他的朋友彼契卡，维克多也在，瓦连金娜也在那里穿梭似地走来走去——一会儿从阳台到厨房，一会儿从厨房到阳台。有的已经吃过早餐，有的在喝茶，加利克和彼契卡把碗碟推在一边，在桌子角上下棋。巴维尔·叶格拉福维奇习惯于不让别人等他一起吃饭，况且反正谁也不等谁，一切都各自为政。瓦连金娜给她的鲁斯兰和加利克准备吃的东西。维拉好象是同尼古拉·爱拉斯托维奇单独吃的，如果爱拉斯托维奇来的话；要是他不来，那么好象是同小姨子——柳芭阿姨一起吃的。缪黛和维克多也经常来，虽然没有人请过他们，他们好象是同维拉一起吃的，每次都给她带些糖果来。而巴维尔·叶格拉福维奇呢，有时同这些人一起吃，有时同那些人一起吃，有时则独自一人——从疗养院里带点东西来吃。但偶尔大家也围着大桌子一起坐下来，于是就乱得一团糟。虽然过去也有过这样的事——大家坐在一起，那是在加里雅在世的时候。

然而加里雅去世了——就象车子上脱掉了一个销子，车轮摇来晃去，车轴也眼看要飞出去了……随它去吧！巴维尔·叶格拉福维奇既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思把这辆大车修好，况且现在已无法修好了。儿孙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一